

白沙人文社會學報

第三期，2004年10月

Journal of Pais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3, October 2004

pp. 231~240

賴和小說與台灣國民性的論證

陳旻志*

Demonstration of islander's characteristic and Lai-he's fiction

by

Chen Ming-Chin

關鍵詞：賴和、國民性、台灣人性格、醫師小說家、病灶

Key Words: Lai-he, characteristic, doctor& novelist, the nidu

*作者陳旻志現為南華大學文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賴和一系列針砭世局的小說中，企圖心最大莫過於〈蛇先生〉一作，其中貫穿的人文關懷，將人心的軟弱及偏執面，刻劃的入木三分。人心之畏「惡病」，猶如畏懼「惡法」，「法律」與「醫學」如何真正的直指人心，其關鍵點在於能不能擺脫「人惑」的迷思，無怪乎法律修訂益繁，秘方也愈見神奇。共同癥結，都反映出凡人不能面對現實，他們都在追尋什麼？同時也在逃避什麼？身兼醫師及小說家「雙重身分」的賴和，勢必不能滿足於這個處境，他必須更冷靜、更理性地去究元決疑，才能有效勘定人心的活水源頭。

Abstract

She Xian Sheng , one of the Lia's satire novel shows his attempt. In this work, it penetrates the weakness and bias of humanity vividly. It is human's weakness afraid of noxious disease and bad laws. But, how can the law and Medicine direct people's real inner nature; the point lies in weather we can escape the myth of temptation. No wonder, the law becomes more and more strict, and complicated. So does the medicine; the prescription has more healing magic. However, both of the law and medicine have reflected one thing in common-that is ordinary people can not face the reality. They even don't know what they are chasing for, let alone what they are escaping for? Lai-her with dual position, doctor and novelist, of course will not satisfy with this kind of circumstance. He should be calm down and be rational to detect and solve the doubt. Thus, he can trance back to the origin of human's inner most heart.

一、前言

魯迅與賴和兩位先驅，對於華人文學史的影響，都寓有披荆斬棘、筆路藍縷的功績。無論他們的影響是大陸的「五四」或是「日據」時代的台灣，只要祛除了地域性的差別之外，兩者的共同點，都在於身兼醫學以及小說家的身分。因此提筆為文，創作的處境與視野，皆能以荷擔時代的沈痾，並且視對症下藥為己任。

平心而論，兩家的小說儘管路數、風格迥異，但是在探討與詮釋「國民性」的焦點上，可以說殊途同歸，除了試圖以文學的手法，作為啟蒙人心的「策略」；並且進一步涵括建設性的方向，採行標、本並治的目標，作為他們寫作小說的宏遠企圖。

魯迅的〈藥〉一作，冰冷地描繪出愚昧的民眾之於革命黨人的心態，甚至以志士的鮮血作為療治痼疾的藥物。一貫表現出他在醫學背景下，長於鑑世的功夫。這種引人錯愕的現象之所以發生的根源，無疑是與辛亥革命失敗的盲點攸關，亦即孫中山所說的尚未「喚起民眾」，同志亟待努力，有著內在的必然聯繫。1907年，魯迅的〈文化偏至論〉中就已提出了「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以及「歐美之強，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則根柢在人」¹。魯迅遂以現代小說之寫作，試圖透過大眾閱讀的廣泛效應，視為「喚起民眾」最為有利的策略。事實上他也成功地在〈狂人日記〉、〈阿Q正傳〉、〈孔乙己〉、〈祥林嫂〉等系列名作中，展示了新舊社會對照之下，人性的覺悟與衝決網羅的歷程。〈狂人日記〉文末中：「救救孩子...」的無力吶喊，置諸當時的世局，直截了當地作出了振聾發聵的揭示。

賴和小說之於台灣社會的意義，也恰與魯迅的心血一致，魯迅的〈文化偏至論〉是他鑑世的處方，而賴和卻對於日本殖民下的台灣人有著鮮明的判斷，尤其是他所概括的「台灣人定型的性格」，十足彰顯了根深柢固的民族性：

我們島人，真有一個被評定的共通性，受到強權者的凌虐，總不忍摒棄這弱小的生命，正堂堂，和他對抗，所謂文人者，藉了文字，發表一襲牢騷，就已滿足，一般的人士，不能借文字來洩憤，只在暗地裡咒詛，也就舒暢，天大的怨憤，海樣的冤恨，是這樣容易消亡。²

這種「島人」的通性，隱然與魯迅〈阿Q正傳〉中闡述的「精神勝利法」，同有一種莫可奈何的悲哀！無怪乎賴和筆下的人物、情節，一方面固然批判日據時代帝國與殖民地之間無情的壓迫，以及永無忌憚的剝削；另一方面卻也是「一刀兩面」式的反映出台灣「島人」那種壓抑、姑息的性格；以致於人與人之間不能真切地團結，遑論爭取自身的覺悟。

¹ 魯迅：〈文化偏至論〉，參見侯吉諒編：《魯迅》（台北：海風出版社，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1994年），頁7。

² 賴和：〈1931年元旦隨筆〉，收於張恆豪編：《賴和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年），頁277。

二、「島人」心態與「晚熟」的理想主義者

借由小說的馳騁及抒懷，無疑地也是諳合「喚起民眾」的共同歸趨；他的小說〈赴會〉中，反映出當時台灣民眾普遍對於「台灣文化協會」推展業務、教化民眾的疑慮。該會雖然突顯出要求日治政府重視「做人的正當權利」，但是此一基本信念，在推行之初，自是不能免除台灣島人因循苟且的根性，甚而協會內部成員在一般民眾的觀感中，亦不見得極具說服力。例如文中嘲諷霧峰林家的產業，就語帶筆削之義：

今日聽講〔聽說〕在霧峰開理事會。

阿罩霧〔霧峰舊名，意指霧峰林家〕若不是霸咱搶咱，家伙〔家產〕那會這樣大。不要講全台灣的幸福，若只對他們的佃戶，勿再那樣橫逆，也就好了。

阿彌陀佛，一甲六十餘石，好歹冬〔年冬〕不管，早冬〔春收〕五，晚冬〔秋收〕討百，欠一石少一斤，免講。³

會中主幹尚且如此，更何況是內部菁英針對會務的主張，也可能在信仰上會有很大的歧義。在〈赴會〉一文中，我們即親臨了這種敏感處，作者含蓄地寫著：「次日的會議，顯然提出了兩派的爭執，似有不能相妥協的形勢，一派以社會科學做基礎，主張階級利益為前提，一派以民眾意識為根據，力圖團結全民眾為目的，議案不能成立，一日便也了結。」這段發生在歷史「名園」盛會的側記，內裡其實充滿著無力感。具體表達了當時身懷濟世大志的菁英們，往往不能免除「路線之爭」的困惑。就以該協會而言，不僅是日據時代台灣非武力抗日民族運動的主力之一，推動之會務諸如發刊會報、設置讀報社、舉辦各種演講會、開辦夏季學校、召開無力者大會、文化話劇運動等等激揚民族意識，啟蒙文化思想、促進農民工人覺醒的活動。多達一千餘名的會員，未始不是網羅了台灣當時的社會中堅分子。但是仍不免面臨 1927 年左右文協分裂的變局，賴和此文，不過是預示這一分歧的前兆。所謂的喚起民眾，並不是一道平順的路線，我們讀〈赴會〉時，即可體認到一般民心的觀望態度。讀到他的〈棋盤邊〉時，我們會驚覺到民間社會之於「民本」、「民意」，甚至於所謂「做人的正當權利」，尚且存在著偌大的落差，十足荒謬。文中一群無所事事的棋友，以保正為中心牽涉的話題，竟一意地將吸食鴉片、開設賭場等末流，硬扯上「尊重民意」的「善政」。棋局裡外充斥著戲謔之意，民眾自覺斯文掃地，屆此也不足為奇；試看其中一段對話，似是而非的論調，即躍然紙上：

為什麼不是民意？你曉得出願者有多少了？免著驚〔別吃驚〕！三萬幾千人。那文化會的人年年所作的把戲，什麼請願運動，蓋印署的也不過是千餘人，就講是民意，難道三萬多人的願望，就不成民意嗎？⁴

³賴和：〈赴會〉，《賴和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年），頁234。

⁴賴和：〈棋盤邊〉，《賴和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年），頁107。

賴和的筆觸恐怕也有幾分是出乎無奈的經驗，當一群熱血沸騰的志士，攘臂揮汗為台灣人的前景請命及抗爭之際，置諸大多數事不關己，渾無切膚之痛的民眾而言，不外乎是隔岸觀火，抑或是參差著人云亦云、道聽塗說的批評。一項甚具立意的主張，可能在有心人之扭曲、散播之下，給予一般民眾的印象，都已經是七拼八湊、是非顛倒的訊息。在〈阿四〉一文中，他透過敘事者阿四，婉拒蔣渭水推薦擔任文化協會理事一職時，寫下這樣一封信：「古人云有死天下之心，才能成天下之事，足下所創事業是為吾台三百餘萬蒼生利益打算，僕亦台人一分子，豈敢自外，但在此時尚非可死之日，願乞把理事取消...」⁵小說中辭去理事一事的安排，對於賴和本人而言，自是有番卑怯及掙扎的心路歷程；在他的系列小說之中，除了社會寫實的層面之外，尚保有一個自剖性的層面。他對個人涉世的盲點及抉擇，其實也如凡夫俗子般軟弱，而非逕以道德，抑或救世的光環，立足社會運動的舞台。略去了小說家的外衣，他的本色當行是一個鎮日必須仰賴「聽診器」維生的凡人。此外在報刊編務上推動「文人相重」的風氣，則可視為個人理想的耕耘及寄託，據林衡哲所述：

當時唯一願意免費替民報做文藝欄主編的就是賴和，但賴和是醫德頗高的醫師，每天看完一百多個病人，已是晚上十點，因此他擔當編輯選稿的工作，便是這十點以後的事，為了潤改來稿，往往工作到通宵達旦，並且犧牲了自己創作的時間，他這種為了台灣新文學的發展，為了使年輕作家的作品品質得以逐步提高，所付出的重大的犧牲與奉獻，感動了無數的後起之秀，並且使《台灣民報》與《台灣新民報》的文藝欄，成為新文學運動的中心。⁶

最明顯的例子是，楊遠的筆名便是賴和替他取的，而他的〈送報伙〉也是發表在賴和主持的民報文藝欄內。賴和在這方面的成就猶如戰後的吳濁流與鍾肇政一樣，可說是台灣文藝不朽的耕耘者。他的現實生活中也同樣充滿著煩瑣、以及世俗的悲歡。寫寫舊時、演練書法，「平生慣作性靈詩」是他的好友陳虛谷為其所做的評點。就其原本的性格而言，大體也吻合於上述他所歸結的「島人」性格。泰半的生命步調，也殘存著擺盪不一，無法遂行理想的軌跡；例如〈阿四〉中描寫的醫校畢業生，原本充滿熱望的前途，被迫因著現實社會的壓迫，充滿無助及困窘。〈歸家〉一作中，描述的也是這種不確定感，理想的光環經不起社會之沖刷，就連故鄉的人情世故，也都是面扭曲的鏡象：「一件商品，在工廠裡設使不合格，還可以改裝再製，一但搬到市場上，若是不能合用，不稱顧客的意思，就只有永遠被遺棄了。」這種心緒，即是一個「晚熟」的理想主義者，不得不然的處境。是以他對社會實況的體認，也遠比一般偏重「橫的移植」的社運人士，更能了解病灶的所在，以及迎刃而解的具體處方。施淑即指出，賴和的〈棋盤邊〉反映的恰是「台灣人定型性格」中「重文輕武」的子遺。就連用來消磨時日的下棋，也總是「文棋」（圍棋）多於「武棋」（象棋）。這種心理

⁵ 賴和：〈阿四〉，《賴和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年），頁247。

⁶ 林衡哲：〈台灣現代文學之父——賴和〉，收錄於《賴和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年），頁269、270。

選擇仍是農業漢族的遺民，因而再怎麼「改朝換代」也換不了他們心目中的正朔和習俗。（此點可以另一篇〈不如意的過年〉為証），無怪乎日本人雷厲風行的「同化」政策莫可奈何，一般民眾仍舊採行過去的歲時習慣（以農曆和陽曆新年之不同心態最為明顯）。⁷這種習性連異族的高壓統治都很難推移，一般民眾也不過採取「佯信」的順民姿態，骨子裡仍壓抑著島人既定的價值取向；在〈歸家〉一文中，流露出故鄉的鄉民之於「學校」的充分不信任（包括法律、警察、西醫），與學校的畢業生反覆辯論著「學校無用論」，以作為和「皇民化」（學校即可視為帝國主義者殖民洗腦的基地）政策相排拒的心態，在對話中一覽無遺：

「永過實在是真好，沒有現時這樣警察……」

「現在的景況，一年艱苦過一年，單就疾病來講，以前總沒有什麼流行病、傳染病，我們受著風寒一帖藥就好，現在有的病，什麼不是食西藥竟不會好，像我帶（染上）這種病，一發作總著（得）注射才會快活，這樣病全都是西醫帶來的。」賣圓仔湯的竟有這樣懷疑。⁸

這番各說各話的結果，也迫使主角不禁吶喊出：「實有好幾種病，是有了西醫才發見的。」、以及「學校不是單單學講話、識字，也要涵養國民性……」。長年以「聽診器」謀生的賴和（自 21 歲醫校畢業後，即在 23 歲返回彰化開設賴和醫院），最能體會到這股民間脈動的心情。「國民性」的涵養談何容易？日人的宰制和壓迫都很難遂行其意，更何況標舉民主、民本思想等進步人士的搖旗吶喊，得以迅速立竿見影？像〈豐作〉一文含蓄提及的「二林事件」，雖可謂「覺悟下的犧牲」，但之於一般農民、庶民而言，卻有殺雞儆猴的作用。在求得溫飽、得過且過的世俗人心之下，種種不合理、不稱心的待遇，咬咬牙也都還可以「隱忍」過去、不提也罷！這些站在「第一線」的真切體認，適足以提供他更為細膩演繹出之於時代病症的看法，而不採行冒進的批判路線。對於後世的讀者在理解日據時代的生活面貌，可提供一個如實而還原的景象。

在〈阿四〉這篇小說中，他憶及了校長的贈言：「將來的台灣會成為醫校畢業生的台灣。」，對於這番開示，讓賴和在日後關注及傾心於台灣社會的「啓蒙運動」，有著「哥白尼」式的轉捩點。林衡哲嘗指出，對於台灣人根本毛病「文化上的營養不良症」，賴和與蔣渭水咸有同感，但兩位同是出身於台北醫學校（即台大醫學院前身）的文化人，蔣氏的成就主要在政治方面，他是日據時代台灣人政治界的精神領袖，而賴和儼然成為台灣新文學的導師。⁹但兩人同歸宿於「醫學」的理性精神，以及「醫師」善體民瘼的獨特表徵。我們一方面可以就小說中看到賴和逐漸走入群眾運動的身影，如〈阿四〉一文領受到宛若「救世主的豐采」、「各個人怕得不到訴苦機會似的，爭先開口陳述。」¹⁰賴和深知這種時代的氛圍注定會將某些人推向高峰。但是看官

⁷ 施淑：〈稿子與稱錘〉，收入《賴和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年），頁277。

⁸ 賴和：〈歸家〉，《賴和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年），頁154。

⁹ 林衡哲：〈台灣現代文學之父——賴和〉，《賴和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年），頁262。

¹⁰ 賴和：〈阿四〉，《賴和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年），頁2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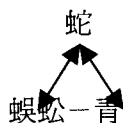
千萬不要忽略掉他的冷靜、細膩的筆觸，如同嚴肅的醫師，正在細睨整個時代矛盾的癥結所在。他要窮究其可能的最大視野，展示這樣一個是非黑白彼此相刃相劇的浮世繪。如果說魯迅的筆鋒像匕首，那麼賴和的筆致就如外科手術刀的手法，讓讀者在摒息凝神間，目擊病灶所在，好好沉潛思量因應之道。

三、「秘方」迷信與畏懼「惡法」的民間困境

賴和一系列針砭世局的小說中，筆者最欣賞的作品，莫過於〈蛇先生〉一作。其中貫穿的人文關懷，不僅企圖心最大，貫穿的手法卻也至為含蓄；在敘述的筆調中，時帶嘲諷，卻又寓有深摯的性情，是一篇理性又不失蘊藉的佳構。通篇焦點可視為一則「捕蛇人說」，寓有鑑世、警世色彩。說明了一位民間良醫的發跡、爭議，以及歸於恬淡的一生。除了捕蛇技倆的專長之外，更擅長蛇傷的醫治，民間咸認為他有「祕傳」的藥方，收效宏大。他的名稱更因為治好一位蛇傷的農民，而遠近皆知。但因此農民之前久經「西醫」之治療，未見起色，而蛇先生之義舉，無疑地牽動了此一「既得利益」者所構成的微妙「生態」（即醫療規範中的法律內容，蛇先生並非正規系統出身，乃所謂的違法者）。構成了犯罪及不相干的種種苦頭（包括供出秘方的內容）。這樣的原委看似荒謬，但在當時苛政嚴法的日治社會裡，不過是司空見慣的社會新聞；卻也藉此夾帶出一系列賴和關懷的時代課題。最根源處，莫過於「法」的設定、施行、在特權所有者、被支配者之間，矛盾卻又「合理化」的生態，若非熟諳此一「遊戲規則」者，又豈能全身而退？稍一不慎即恐遭無妄之災，甚且淪入「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窘態。

文中闡示了蛇先生謀生的技能，亦即高明的捕蛇要領，可謂妙解：

蛇的大敵就是蜈蚣，蜈蚣又怕水雞（青蛙），水雞又是蛇的點心。所以蛇要戒備蜈蚣的侵襲，常使牠在支配下的水雞去做緩衝地帶，守護蛇的穴口。因為有這樣關係，拿水雞的人，對蛇自然有著戒備和研究，捕蛇的技倆，蛇傷的醫治，都有一種祕傳，蛇先生就是因此出名。¹¹



蜈蚣—青蛙 之間猶如「食物鏈」的關係，就在層層牽制之下，形成了一個看似合理的循環，通篇觀來，卻寓有作者鑑世的用心。在整個蛇先生捲入「違法」的醫療世界中，我們似乎也感受到日治時代的一種既荒謬卻又合理的關聯性，即「法」與「警察」、「保正」（或本文之西醫）與「人民」的關係，儼然是上述動物界的「食物鏈」

¹¹賴和：〈蛇先生〉，《賴和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年），頁81、82。

的芻型。但可悲者，自始自終，「人民」都是被剝削者，（不能直接參與『法』的設置）是另外三者共同榨取及支配的對象。尤其悲哀的，莫過於整體掌握者實乃日本帝國主義（及捕蛇者），恰為坐收漁翁之利（皇民化的殖民政策）。「法」之存在既無必然理據，完全玩弄於它的「特權所有者」，一人之好惡、一時之情緒，遂以為定法，賴和在文中不禁為之讚嘆其法力之宏偉壯觀：

這是保持法的尊嚴所必須的手段，恐法律一旦失去權威，它的特權所有者—就是靠它吃飯的人，準會餓死，所以從不曾放鬆過。像這樣法律對於它的特權所有者，是很有利益。¹²

我們在他其他篇中也看的到這種喫人的嘴臉，例如〈一杆桿秤仔〉中巡警任意決定了「度量衡」的章法，欺人太甚，並怒將「稱仔」打斷擲棄。此一「稱仔」又寓有延伸的嘲諷，可以側見了苛政之無孔不入。¹³涵蓋了什麼通行取締、道路規則、飲食物規則、行旅法規、度量衡規紀，舉凡日常生活中的一舉一動，通在法的干涉、取締範圍中。

凡此種種就算是今人觀來，也不免瞠目結舌，嘆為觀止。又如同〈不如意的過年〉一文，尖酸地刻劃了一位查大人之於「年禮」之減少，大感光火，恨不得多找一些倒楣的人民開刀剝削，好饜足一己之私囊。但發覺人民思想已在變遷，已然威脅到「法」的合理性，在自言自語的心情下，竟表述了特權者不安的潛意識。¹⁴遷怒的又豈是查大人一人，這一現象事實上也反映出「人心思變」的一個可能性，有可能牽動整個因「法」而維繫起來的「命運共同體」，因而最後也僅能找個無辜的孩子開刀「示威」一番。這點在蛇先生的遭遇上，也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因實無構成犯罪之動機，卻又被法律之使用者羅織罪名，最後為著「儆戒」一番，「除去拷打別有什麼方法呢？拷打在這二十世紀是比任何一種科學方法更有效的手段，是現代文明所不能夢想的發明。」嗚呼哀哉，「文明」至此，實讓人有哭笑不得的感慨！

又如文中嘲諷這班無恥西醫的生活樣貌，更令人怒不可扼。賴和身為醫生，自是最了然這種嚴苛歲月中，同業中藏污納垢、惡性循環的病灶所在。此文不僅揭露了當時「西醫」的盲點所在，同時也一體兩面反映出鄉民對於民間醫療「秘方」迷信的困境。真正做到了一個理性而嚴肅的醫學者、追根究底的考證精神；也正是剋就上述「體檢」整個時代塑造出來島人的「國民性」問題，蛇先生的「著手成春」竟也鋪衍成一則民間的傳奇：

蛇先生既出了名，求他醫治的人，每日常有幾個，但是他因吃過一回苦，尚有些驚心，起初總是推推辭辭不敢答應，無奈人們總為著自己生命要緊，那管到別人的為難，且因為蛇先生的推辭，屢信他秘方靈驗，屢是交纏不休，蛇先生沒法，在先（起初）只得偷偷地秘密與那些人敷衍，合該是他時氣透了（走運了），真所謂著手成春，

¹²賴和：〈蛇先生〉，《賴和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年），頁83。

¹³賴和：〈一杆桿秤仔〉，《賴和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年），頁59。

¹⁴賴和：〈不如意的過年〉，《賴和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年），頁68。

求醫的人便就不絕，使他無暇可去賣水雞，雖然他的生活比以前更覺豐裕快活，聽說他卻又沒有受人謝禮。¹⁵

賴和透過蛇先生的人物刻劃，將人心的軟弱及偏執面，刻劃的入木三分。人心之畏「惡病」，猶如畏懼「惡法」，「法律」與「醫學」都不能真正的直指人心，其關鍵點都不能擺脫「人惑」的迷思，無怪乎法律修訂益繁，秘方也愈見神奇；共同癥結，都反映出凡人不能面對現實，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違論為「自己」爭取合理的「權利」。我們看〈歸家〉中懷念「過去」的小販言談，看〈豐作〉中迷信獎勵金而方知受到會社蒙蔽的蔗農，看到〈赴會〉中眼見一大群虔誠的「燒金客」，他們都在追尋什麼？同時也在逃避什麼？就佛家而言，都是不能「正見起信」，祇能隨波逐流，祇能抱怨現況。身兼醫師及小說家「雙重身分」的賴和，勢必不能滿足於這個處境，他必須更冷靜、更理性地去究元決疑，才能有效勘定人心的活水源頭。在報刊上他展現了前述「文人相重」的大格局，面對「法律」與「醫學」，他深知有賴於「治標」和「治本」雙管齊下的策略，才能針砭時疑，撥亂反正。施淑即以「稱子」與「稱錘」的關係，肯定了賴和小說中的理性精神：

這桿魔術的稱子，因為是官廳專利品，因而隨時可以毀在官廳及其代理人手上的稱子，從根本上侮辱了啓蒙思想者對於客觀的公平合理的樂觀信仰，更從根本上否定了理論上應該建立在自由平等博愛正義等代表資本主義精神的法的尊嚴，憤怒的賴和不能不從頭檢驗他獻身其中的真理。¹⁶

所以在〈不如意的過年〉中，他更進一步地展現了之於「菁英分子」們的要求，屆此也相對的提昇批判的層次：「因為法本來的作用，就是在維持社會於特定範圍中「壞」、「墮落」，猶是在範圍裡「向上」、「進展」，便要超越範圍以外。所以社會運動者比較賭博人、強盜，其搗亂安寧秩序的危險更多。」¹⁷我們既然已經目擊了日治社會下，種種不合情理的法律，而一但將來人民有權制定屬於台灣人的「大法」時，又豈能自以為是，重蹈覆轍？「蛇先生」一作無疑是他思惟上的心血所繫，是以小說後半段，遂極力闡釋另一位專程前來與蛇先生切磋「醫理」的西醫。兩人鞭闢入理的對談，亦即關聯著「秘方」的實質內涵。世人之迷信「秘方」，也正如盲信「法律」可以解決一切的是非及爭議，殊不知如何「循序漸進」地建構一客觀而有效的軌則；因此治絲益棼，無怪乎雪上加霜，不得其門而入；不僅延誤了問題解決的時效，更徒增許多不相干的「后遺症」。這兩位看重「問題」的醫學對話，很發人深省，摘錄其中警句，甚能呼應本文上述的宏旨：

「蛇不是逐尾（每一尾）有毒，雖然卻是逐尾都會咬人，我所遇到的一百人真被毒蛇所傷也不過十分之一外（餘），試問你！醫治一百個病人，設使被他死去十幾人，總無人趕嫌你咸慢（差勁），所以我的秘方便真有靈驗了。」

¹⁵賴和：〈蛇先生〉，《賴和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年），頁85、86。

¹⁶施淑：〈稱子與稱錘〉，收入《賴和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年），頁280。

¹⁷賴和：〈不如意的過年〉，《賴和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年），頁71。

「不是這樣，人總不信它有此奇效，太隨便了，會使人失去信仰，」「我已經講過了，我到這樣年紀，再活有幾年，我講的話不是白賊（說謊）。這地方的毒蛇有幾種你也明白，被這種毒蛇咬著，能有幾點鐘生命，也是你所曉得，毒蛇的蛇多是陰黃（陰毒），咬傷的所在無多大疼痛，毒是全灌入腹內去，有的過不多久，併（連）齒痕也認不出來，這樣的毒是真厲害，待到發作起來，已是無有多久的生命，但因為咬著時，無甚痛苦，大多看做無要緊，待毒發作起來，始要找醫生，已是來不及，有了這個緣故，到我手裡多是被那毒不大厲害的蛇所咬傷，這是所謂陽黃（陽毒）的蛇，毒只限在咬傷的所在，這是隨咬隨發作，也不過是皮肉紅腫腐爛疼痛，要醫治這何須有什麼秘方？！」¹⁸

這些發人深思的論點，反映了人心失據，病急亂投醫者，莫過於此；而有心於社會運動之「啓蒙」者，也必須時時警惕，這一位西醫遂將蛇先生所贈之一包「秘方」帶回去化驗，化驗結果，還真是令人錯愕：

該藥研究的成績，另附論文一冊乞即詳覽，此後要選擇材料，希望你慎重一些，此次的研究，費去了物質上的損失可以不計，虛耗了一年十個月的光陰，是不可再得阿！此次的結果，只有既知巴豆，此外一些也沒有別的有效力的成分……！¹⁹

民間有一說法，咸以為「秘方秘法，一經道破，便不應驗。」置諸於此，所謂的「方」、「法」不過是仰賴客觀的考證精神，才得以還原他的本質及理據何在。

四、結論

賴和的真知灼見，就表現在如實的反省與感同身受的不安。「法律」誠如他所謂「魔術的稱子」，端看使用者用心之正邪。至為妥當的做法，不外乎將其本質及底蘊，公諸世人，訴諸「科學」的與「客觀」的分析。這一關懷，誠為賴和小說意境提昇為思想高度的體現。

這一系列作品，之所以洞中肯綮地直指人心的盲點，勢必也是整體性的涵攝了賴和小說中「行醫濟世」的一貫關懷。他一手拿著聽診器，釐晰人心之脈動；另一手並不忘發為至性至情的筆墨，作為時局之風標。如是持恆探索的精神，也正是許多兼具「醫學」背景的文學家們，令人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的理由；也因此「小說」中「以小說大」的敘事策略，體現出應有的人道關懷，也就份外歷久彌新。賴和小說成功的演繹了這一人文信念，深信在今昔對比的視野下，這一位滿懷憤悱情操的人格者，依舊有其不能被替代的特質，令人緬懷不已。

¹⁸ 賴和：〈蛇先生〉，《賴和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年），頁89—92。

¹⁹ 賴和：〈蛇先生〉，《賴和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年），頁93。